

红星照耀中国

第四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W. A. R. 1870

1870

1870

D2/221!4

00119572

红星照耀中国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195728

光明日报出版社

暗斗明争进江全

马 长 炎

孔 明 施 暗 计

江全,即和县、江浦、全椒三县交界的地区,是与汪伪所盘踞的南京城隔江相望。自从敌伪把它划作“绥靖区”之后,日寇、汉奸、特务、土匪、恶霸、流氓,搅得天昏地暗。后来国民党顽固派又塞进一个二支队来。他们借口抗日,向老百姓要苛捐杂税,要壮丁、米面和鸡鸭酒肉,要得泥菩萨也不敢穿金。老百姓日子没法过,整天盼望阴云快消散,早日见太阳。阴云几时散,太阳哪天出,只有濮家集教书的孔明先生常常吐露些。他总是说,阴云不会老遮着太阳,光明就要来到人间。



工程兵战士迅速架起吊桥,保障部队越过江河障碍

孔明先生姓孔名明,不是诸葛亮,可是,人们总爱说他是诸葛亮再世。穷人们心里明白,他眼望着穷人,心贴着穷人。有钱人家子弟上学,他照章收费;贫寒人家子弟读书,可以减半或免费。人们夸他心底好,学识高,办法多,结交广。穷人推崇他不说,有一天,一个油头滑脑的商人也登门拜访了。

这商人是石桥的,贩了几条牛,被“黑头鬼子”(伪军)碰上了,诬他是顽二支队的探子,把牛全部抢走。商人走投无路,跑去央求顽二支队帮他夺回。哪知这顽二支队的人骂他是汉奸,搜

遍了全身，一顿拳打脚踢揍了出来。他无可奈何，向孔明哭诉了一番，要孔明给他指一条出路。孔明说：“你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怎么好到石灰店里去买眼药！顽二支队和黑头鬼子穿连裆裤，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是呀，这个年头，哪怕你八面玲珑，也得倒霉。我这跟头栽大啦，全靠你搭救了。要是从此翻了身，永世忘不了你的恩典！”

孔明说：“帮忙，我是热心的。有条路不晓得你愿不愿走？”商人亏了血本，比死爹娘还伤心，一听有条路可走，又眉飞色舞起来，要求孔明快讲。孔明就向他点出了和(县)、含(山)地区我军新根据地的情况，说那边缺什么货，并替他介绍了几个熟人。

这商人早听说和含那边到了新四军，也曾想去跑跑生意，但因不摸新四军的底，怕风险，不敢迈步。现经孔明一提，又介绍了熟人，就决心到和含地区去走一趟。孔明说：“人情做到底，我手边还有几个余钱，你拿去添本求息吧！”

商人嘴快腿也快，接连到和含地区跑了几趟生意，尝到甜头，又把这条生财之路，偷偷地告诉给他的同伙。一串二、二串三，跑这条线的商贩多起来，新四军在和含地区的名声，也随着传到江全地区。群众七言八语地传说：“新四军真好哩，买卖公平，不扰百姓；人家可是真心实意抗日的。”还说新四军有一次一家伙吃掉了鬼子多少兵马，另一次消灭了多少伪、军，越传越神。传到濮家集，有人就悄悄问孔明，这些话是真是假。孔明笑道：“无风不起浪，有浪定有风。”

这孔明先生到底是什么人？他原是我们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当时我新四军第七师正向东北地区发展，要打开与军部和第二师的交通线，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以来，军、政攻势齐下，很快开拓了和含大片地区，紧接着矛头直指江全。但是，江全地区比和含地区更加复杂，这里横跨苏、皖两省，三县交界，是桂系顽军与南京伪逆私下勾搭的捷径；同时，又是我七师与二师的接合部。这里，除了日伪和顽军的统治势力以外，刀会林立，三番遍布，当地人几乎不在帮就在会，各有政治背景。过去有些军队进去，都因没有群众基础，没能站住脚。所以我们这次在武装进入之前，先来了个“政治进入”。

当然，象孔明先生这样打前站的，不只一个，而是好多。他们分散到江全各地，有贩牛的，有剃头的，有做裁缝、打铁、做长工的，也有打入敌伪据点里去的，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交朋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象南瓜牵藤，巴壁虎爬墙，一条线，一条根扎向群众中。“孔明施暗计”，这不过是许许多多巧妙活动中的一件事而已。

真假吴参谋

从和含通向江全的荆棘路，经孔明这些人走出来之后，我们和含独立团在向江全出发之

前，先组织了一支精悍的侦察队，由侦察参谋吴瑞生同志率领，跳进了八大禁地区。

从前有人进去，村村鸣锣，庄庄点火，大刀会会众们吆喝不停。这次侦察队跳进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群众听说来的是新四军，不但不再鸣锣点火，有的还点头打招呼说：“知道，知道，新四军是抗日为民的好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侦察队大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找群众谈心，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帮助群众于活。群众都说：“早就听说新四军好，今天一见，果然是真。”当顽二支队再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时，人民群众便悄悄指着他们的脊背说：“共产共妻不是共产党，而是你们自己！”顽二支队看到群众都不听他们的了，即派出便衣队，冒充新四军，欺骗老百姓，到处打家劫舍，一时又闹得群众不明真相。有的人说：“新四军不会吧！”但也有人怀疑新四军变了。

大家听到这情况，非常仇恨二支队。指责他们不打日本鬼子，反而冒充新四军，糟蹋老百姓，破坏团结抗日。对这些狡猾的狐狸，我们特别警惕。

这天晚上，我军到一个村庄刚驻下，地下党的同志来报告：在三里路外的小村里，住了几个便衣，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要鸡要鸭，还要大姑娘陪酒。领头的那个，自称是新四军的吴参谋。我们一听，断定又是顽二支队搞的鬼。就对吴瑞生同志说：“《水浒》上有真假李逵，现在又出了真假吴参谋。吴瑞生同志，你看怎么办？”

吴瑞生同志早已气得脸发紫，他猛然跳起来说：“首长，让我去干掉它！”

“你怎么个干法？”

“来一个将计就计，化装成群众送鸡鸭酒肉进去，打它个措手不及！”

我们说：“好！捉住活的，戏就更好唱了。”他说了声：“保证捉活的！”领着几个侦察员就走。

《水浒》上的真李逵是粗中有细，我们的吴参谋却是细中有细，那个冒牌的吴参谋自然逃不出他们的手。半夜时光，吴瑞生等同志就把那批坏蛋捆绑来了。

第二天，我们在山村小广场上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会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吴瑞生同志一声令下，侦察员押解着冒牌的吴参谋和一群小走卒走进了会场。人群活跃起来，有的指指点点地说：“不错，就是这群坏家伙，半夜到处砸门找青年妇女！你看他们那副下流象，那配做个新四军！”有的接着说：“我原说嘛，新四军不会嘛！那个方方脸、挎匣子枪的，才是新四军的吴参谋，人家怎么会做那种狼心狗肺的事呢！”……

会上，我们对群众讲了话，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灭匪保民的政策，当场揭破了国民党二支队的罪恶。然后向大家说：“老乡们，这群坏蛋抓来了，交给你们处理吧！”

群众齐声喊“好！”有的叫把他们统统枪毙，有的说：“砸死他！不要浪费子弹，留下子弹打日本鬼子！”有个老夫子模样的人说：“自作孽，早该死——早该死啦！”

群众纷纷拥上来，指着那个假吴参谋的鼻子臭骂。有一个小脚的老奶奶说：“狼心狗肺的

家伙,也有今天啊!你们活活烧死我的老头子,把我一家抢得干干净净,打得我身上红一块、紫一块,一点好肉也没有,今天我要吃你的肉才能出我的气!”说着,又哭,又打,又是咬,几乎昏了过去。吴瑞生同志赶忙上去扶住劝说:“老奶奶,有话照说,有苦就诉,我们一定替你们报仇!”人们的苦水象开了闸门,倾泻而下,顽二支队的滔天罪行,被一一揭发出来。

接着我们宣布:群众的东西,一律归还原主。顿时,摆在桌前的大一担,小一箩的东西,全由物主认领回去了。最后宣判:把以假吴参谋为首的三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特务,就地枪决,以平民愤;其他的教育释放。这样处理,体现了我党政策。博得群众一致拥护,都说为他们除了害,出了气。

消息没脚,日行千里。公审大会的影响,迅速传遍了江全。人们都说:“新四军真是抗日救国、灭匪保民的。这样好的军队,总算给盼来了!”

捉 放 总 坛 主

敌人见我们在群众中的根越扎越深,就在刀会中大肆造谣污蔑我们,一时引起刀会头领们对我们的怀疑,有的甚至公开和我们作对。应该怎样对待刀会,师政委曾希圣同志曾经嘱咐过:“刀会虽然为封建把头所掌握,据了解,会众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要设法从下层突破,争取广大的基本群众。”曾政委还特别反复地强调:凡是愿意抗日的人,都要争取。要很好地运用“急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

我们依据首长的指示,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决计首先做好八大禁地区的工作,争取八大禁的刀会。

这里的总坛主名叫王世喜,四十多岁,世代地主兼族长,手下有十几条枪。还在他叔父当总坛主的时候,就以“防匪保家”的口号,笼络了一部分人。日本鬼子占领香泉、高王店一带后,他的根本利益也受到威胁,便同顽二支队拉了一把,合作抗日。有一次鬼子“扫荡”,王世喜的叔父想露一手,和鬼子硬干一场,便请顽二支队助他一臂之力。顽二支队满口应承,借了十几条枪,还说派一个营助战。不料火线一拉开,枪一响,顽二支队的兵跑得无影无踪了。大刀会遭到惨败,王世喜的叔父被俘,砍头示众,头臭了还挂在树桠上。这还不说,顽二支队又给八大禁送来了一份假清单,说他们伤亡几十人,抚恤养伤费要五十石大米;消耗子弹一万多发,要五十石大米。共计大米一百石,非立即偿付不可。王世喜心里非常不满,觉得为了打鬼子,八大禁烧了房子死了人,国民党政府不仅丝毫没有帮助他们,反而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便想办法和他联络,争取他和我们一同抗日。

谁知顽二支队的魔爪又伸过来了。说什么新四军要搞减租减息，穷人发动起来，刀会要解散，坛主们是要下台的。王世喜虽然明知顽二支队不怀好意，但是怕我们的力量小，站不住脚，不敢接近，以免顽二支队知道他们和我军有联系，更加受打击。

既然这样，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找到。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吴瑞生同志先带领七八个人，都是大刀会会众的打扮，同事先安排好的倾向我军的会众混在一起，闯进了王世喜的大院。王世喜正在烧香叩头，祭主求神，便把他们的枪支缴了。会众气愤不平。吴瑞生同志说：“我们无意伤害王坛主，请他去商谈抗日救国，灭匪保民的大事。”会众说：“你们来一下不是就要走吗？”吴瑞生同志说：“新四军来了是不走的。我们的所作所为，你们也都是知道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怎样说就怎样做，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一来，会众都呆了。个别想动的，又怕伤了坛主，也没敢动。王世喜惊惧之余，他说：“要谈判就谈判，为什么恶请？”

吴瑞生同志说：“我们多次善请不到，只得恶请；恶请善和，也是好事。”

“好吧，到哪里去？”

“不远就到。”

当他们走出院门，正好与前去接应的我军部队会合。便一同回来。这时，酒席已摆好。

我们请王世喜入坐，倒了一杯酒，接着说：“王坛主，受惊了！先饮一杯，压压惊。”

“哪里，哪里！不敢，不敢！”王世喜神态很不自然。

随着王世喜而来的十几个会众，见到这种场面，惊喜交加，满肚子怀疑、愤怒，消除了大半。我们对于来人，都是一律招待，他们更感到新四军对人不错。

当我们解释了请他来的用意，说明了我们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王世喜的心神才定下来，连连称是。最后谈到具体条件时，我方要求王世喜要遵守的：一是共同抗日救国；二是实行减租减息，好让大家都有饭吃；三是同不抗日还为非作歹的军队断绝关系；四是灭匪保民；五不准走漏我军的消息，并经常将敌人的一切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也主动提出，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发还缴来的枪支，在他的范围内，仍有他们刀会活动的自由。王世喜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叫会众捉来一只大公鸡，当场杀鸡盟誓，立下文凭，各执一纸。我军护送他返回原地。当以后把谈判的结果在会众中传达和宣传时，群众都认为，只有依靠新四军，才能抗日救国、灭匪保家。从此以后，八大禁一带的刀会，就被争取到我党我军的抗日红旗下面来了。

除 害 安 民 心

八大禁地区的局面一打开，大部队活动有了回旋余地，我们立即把和含独立团主力调进江全地区。部队一进八大禁，便摧毁了杨石庵的伪政权，吓走了盘踞金城庙的伪军，瓦解了石村

庙伪据点……”继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我军控制了杨石庵、官渡河口一带,打开了和第二师与军部的交通线。

当我军继续向八大禁东北,东南圩区发展时,国民党江浦县政府及其二支队,趁我军立脚未稳,派了反动军官和特务,胁迫刀会会众万余人,由顽军压阵,象疯狗一样的向我军扑来。

那是一个初冬的日子,我军正由八大禁向孟姜庙、石桥一带活动,宣传合作抗日。忽然圩区里一片锣声,大刀会会众云集。他们喝了药酒,“猪头疯”发作起来。我们发现这情况,一面散发大量宣传品,一面指挥部队分两路退向张家集。每过一个村庄,都对群众说:我们不是打不过他们,而是不想打他们;看到他们大都是被欺骗的穷人,因此我们让他们。“刀枪不入”是骗人的,请他们劝阻自己的亲人,不要受坏人的欺骗来追打我军。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硬要再逼,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自卫。枪一响,子弹是没有长眼睛的。……

一面宣传,一面向后撤。从中午到下午,连退了几十里,最后退到张家集后面的大山上。战士们纷纷请战。有的说:“我们不能再退了,如果再退,他们就更加嚣张。”有的说:“日本鬼子都揍了,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这几把破大刀!”……于是,我们进行了紧急动员,向部队全体同志再次解释,大刀会是受了反动派的欺骗。这场斗争,我们不单是在军事上要打胜仗,而且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使群众更认清我军是为人民的;我们不到万般无奈时,决不开枪。同时也向大家交代清楚:到此为止,再不后退一步。他们再追上来,就地还击。但开枪要注意两点:第一,尽量不伤会众,组织神枪手专打穿黄呢子军装的军官,打裹黄头巾的刀会头目;第二,一旦把他们打垮,不能随便追击,更不能杀害一个俘虏。



工程兵部队帮助清华大学民兵工程兵团进行训练

刚刚布置好,顽军就逼着刀会向我军扼守的山头攻击,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才开始还击。

刀会追了半天,药酒已经解了;特别是我军这一路上的宣传,使许多人的头脑开始清醒。

我们一阵排子枪打倒一些穿黄呢军装的指挥官,放倒几个包黄头巾的头目,他们便乱作一团,丢下大刀往回跑去。冲上来的会众,被活捉了。他们纷纷哭诉说:“我们是不愿打你们的,都是他们(指刀会头子和顽军官)欺骗和逼迫我们来的。”

收兵后,我们慎重地处理了善后工作。对于俘虏,全部教育释放;负伤的给敷上药,着人扶着或抬着回去,每人还发给路费和传单;对被打死的会众,都用白布包上,买了棺材装好,写好信,让他们的家属抬回去;对真正穷苦的,还发给一些救济款。

我军这样仁至义尽,使群众很受感动。就连一些死者的家属也说:“新四军真是好心人。人死了,也不能怪新四军,只怪顽政府和二支队,把人拉去替他们挡炮火!”

我们粉碎了顽固派利用刀会向我们进攻的阴谋诡计后,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了更多的刀会,团结了更为广大的群众。从此以后,江全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一九四三年初,鬼子一千多人向我石灰张、八大禁一带进攻,想摧毁我抗日民主政权,赶走我军,截断我师与二师、军部的交通。我军三百余人,与当地群众、刀会一起反击敌人,激战了一整天,歼敌一部,将敌人完全击溃,终于取得了胜利。以后,乌江的鬼子(有一部分伪军)向我石村庙偷袭,枪声一响,周围群众自动带着武器配合我军,将敌人层层包围。战斗了几个小时,将敌全歼,缴获其全部武器。这样的战例,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经过这一系列的战斗,我军战斗力增强了,队伍壮大了,根据地也更加扩大了,巩固了,从而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不可分的关系,人民群众都称呼我军为和含江全的子弟兵。

浦东反“清乡”

朱 亚 民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带着浦东五大队的最后一部分人员撤到浙东。一天，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找我去，说：浙东区党委决定，要我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他并强调地对我说，党中央指示：敌人兵力不足，“清乡”必不能持久；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敌人的“清乡”是可以粉碎的。浦东地区大部队进去活动困难，但组织精干的武装在那里坚持斗争，则是完全可能的。

浦东三面环海，一面是黄浦江，地区狭窄，南北约百余里，东西仅七八十里，紧靠着敌伪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上海。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上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敌人的要害之地。坚持浦东斗争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虽然那儿象围棋上的一只“死角”，无法取得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直接援助。但我们坚信：只要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去做，坚持党的政策，紧紧地依靠我们在浦东的群众基础，一定能把这只“死角”走活的。何况还会得到上海党的秘密活动的策应。

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封锁了杭州湾，浦东各城镇都组织了“清乡委员会”，鬼子大量增兵，等他们把“清乡”封锁圈完成，我们就无法进去。因此我在接受任务后，连忙回到部队，挑了十一个熟悉浦东情况的同志（其中有三个党员），换了十支短枪，马上从古窑浦登上一艘方头“沙飞”，乘风漂向浦东。

我们登陆后，天亮时赶到七仓墩，便派人去找乔乡长。

他是一个比较靠拢我们的伪乡长，见我们回来了，大为惊异，连说现在风声很紧，东洋人到处砍竹子，就要在海边打篱笆墙了。他还关切地对我说：“你们还是赶紧走吧，这时不走，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看他那紧张的神色，我就索性对他说：“正因为日本鬼子要‘清乡’，我们才赶回来的。”他见我们坚决要留在浦东，也打起精神说：“好吧，既然这样，小弟也不敢忘了抗日。不过大家还得小心点，免得吃亏！”接着我又告诉他如何应付鬼子，怎样和敌人的政工人员、伪军政人员拉关系。因为他在我党教育影响下，还有抗日之心，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利害关系之下，也不能不应承我们给他的任务。

第一个关系接上头后，我们就向南汇中心区活动。由于“清乡”在即，过去盘踞在农村里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几个月前就撤出了浦东；“忠救”张阿六本人不出面，却派他的徒弟带着部队，

进据点当汉奸去了。农村中一度出现了“真空”地带，这给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反“清乡”的准备工作以很大便利。

我们一路上宣传反“清乡”的道理，安定群众情绪，动员和组织农村中热心抗日的青年，成立“兄弟会”之类的秘密组织。建立联络站，整顿情报网。由于浦东环境特别复杂，根据上海地下党活动的经验，我们又从这些组织中，选择比较可靠的对象，直接建立秘密关系，准备在那些人数较多的组织一旦遭到破坏时，我们仍能掌握到当地的情况。

在一段不长的活动时间内，又先后找了几个过去和我们有联系的乡长。虽然他们都担心日本鬼子“清乡”，但在我们党的政策争取下，大部分人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只有一部分中上层统战对象，由于形势紧张和人事变迁的缘故，不肯和我们见面。有的只回一个条子，申诉他们目前处境的困难，请求我们原谅，条子下面连名字也不敢写。其实，我们早有准备，并不想依靠这些人，主要的是依靠基本群众。

经过一段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群众对“清乡”的恐惧心理减轻了；认为我们的队伍回来了，又有靠山了。也有的群众发现我们来来去去就这几个人，连“长家伙”也不见一根，又忧虑起来：“你们大部队都撤走了，留下这几个人，能顶什么事？”少数胆小的老百姓，则当面劝我们暂时离开浦东，避一避风头，免得给鬼子碰上了，大家触霉头。

到十月里，“清乡区”四围的篱笆墙已团团围好了。敌人调集了矛字三八二四、三八二五等主力部队（相当于三个团的兵力）配合伪匪刘铁成部和伪税警队约五千余人，对浦东的奉贤、南汇、川沙三县实行全面封锁。敌人控制了大小城镇，到处设据点。连乡下比较大的住宅，都驻上了部队。然后，自南向北，有计划地全面行动，分区“清乡”，采取多路出动、分进合击的战术，在指定区域内反复“搜剿”，队伍密得象梳篦一样。经过敌伪专门训练的“清乡”政工人员，也大批地下乡清查户口，恢复保甲制度，组织“乡民自卫队”，强迫老百姓在庄头设岗亭，昼夜放哨敲锣。我们走到哪里，锣声就响到哪里。

浦东又是一片平原水网地带，敌人的据点密密层层，不管我们在哪里，周围三五里总难摆脱敌人据点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将全队分为三个小组，两个小组插到边沿区分散荫蔽，以待时机，我带一个小组转移到北边祝家桥一带活动。

我们这个组不进大村庄，专找偏僻地方的小宅手、祠堂和坟山屋居住。有时也蹲蟹棚。生活艰苦和形势紧张，大上海花花世界的影响，乡保长糜烂生活的勾引，严重地损害着个别同志的斗志。这时，我们更加体会到：要打开局面，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还必须对敌人展开积极进攻，只有战斗的胜利，只有打击敌人的威风，才能长自己志气。因此，我们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决定找机会打一仗。

可是在“清乡区”内，敌人机动力量占绝对优势，我们要打好第一仗，又该怎样下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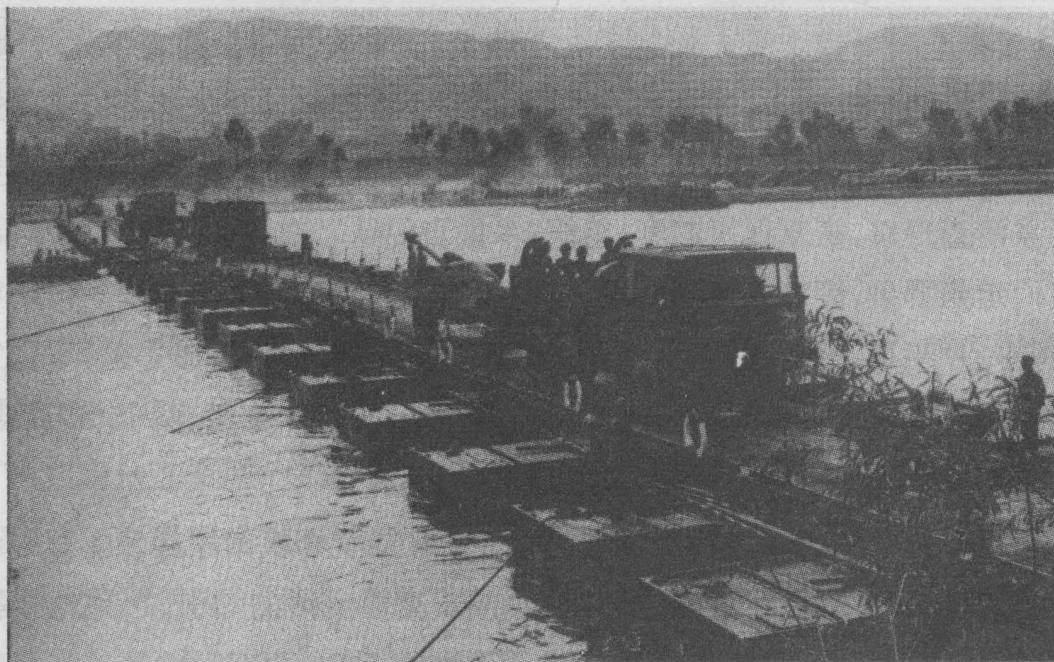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们正为这事纳闷,恰好南边小组来人联系,说乔乡长按照我们的话,和苏家码头“检问所”的一个伪军拉上了关系,一切都商量好了,单等我们过去动手。

夜里,我们全队出发,突然扑向奉城南面。路比较远,还要通过层层封锁线。我们依靠群众的帮助,过村庄时要先去个人打招呼,叫站岗的老百姓让我们通过以后再敲锣。大桥有鬼子站岗,我们绕道从小桥通过。就这样,我们穿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

在七仓墩附近找来了乔乡长,了解这个内线关系的情况。乔乡长拍着胸膛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原来有个伪军在鬼子面前吃了亏,一心想报复。我们那个小组的领导人和乔乡长,抓住了这个机会,已向伪军作了不少工作。乔乡长还和那伪军喝了同心酒,拜为把兄弟。

我们见时机成熟,当即作了个巧安排。里应外合,悄悄钻进了敌人的据点。只用三发子弹,就结束了战斗。打死三个鬼子,缴了伪军的全部枪械。当附近据点敌人闻讯出动,如临大敌地包围了那个地区时,我们早已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休息去了。

第二天,我们又得到情报,敌人把准备向北压的机动部队,匆匆地调回南边去了。又是一个机会,我们当然不会放过,便连着在三灶地区打了两仗。先后打死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战斗虽然不大,消灭敌人也有限,但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清乡区”内,竟发生了这样的事,给敌人的震动是不小的。这样一闹,把敌人的“清乡”步骤搅乱了。他们慌忙收缩,那些仅有三五个鬼子带着一班伪军下乡设立的小据点,一个也不见了。被敌人拉到自卫队里放哨的老百姓,也都放下锣回家去了。我们的天地宽阔多了,全队不但可以集中行动,而且队伍一天天扩大。



1959年至1962年,工程兵仿制成功了防坦克地雷、

快速履带式敷路机和重型舟桥器材。

这是用仿制改进的重型舟桥器材架设的浮桥

当然，日本鬼子挨了几刀是不会甘心的。从此，他们除了集中兵力继续军事“搜剿”外，特别加强了间谍活动，通过特务机关、伪政权、伪警察、伪军和保甲系统，侦察我们的行踪。同时，“清乡委员会”还指使大批身上挂个小铜牌子的伪政工人员下来清查户口，捕杀与我们有关系的群众。对原先替我们工作的乡保长，进行威胁利诱。大批地收买地痞、流氓、白粉鬼，建立情报组织。在很短时间内，我们的情报站给敌人搞垮了好几个。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被汉奸敲得倾家荡产。这种新形势逼迫着我们不得不把斗争目标先放在压汉奸上面。

首先，我们镇压了一批明目张胆地下乡来整顿保甲组织汉奸，使得“清乡委员会”的一些坏蛋，再也不敢单独下乡动了。

在“清乡”期中，坚决和我们作对的是沙鹤镇上的一批汉奸。因为那里离我们中心区较远，又是有鬼子驻守的据点，奸们胆子特别大，肆意敲诈勒索老百姓。一天，我们趁沙鹤镇的敌人调兵向公路以东“扫荡”的时候，远途奔袭过去，把伪镇长、清乡主任和情报队长等反动头目全部收拾了。第二天消息传出，震动浦东。从此一些伪镇长、乡长纷纷向我们打招呼，声明他们不是“真汉奸”，愿意给我们送情报、送子弹，帮助我们向镇上商店征收抗日捐税。后来，日本鬼子知道了这些情况，也没办法。听说他们有一次召开行政会议，鬼子公开说：“东洋先生心里明白：你们区长以上的人，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二分相信游击队，区长以下的人，七分相信游击队，三分相信东洋先生；乡长嘛，一半的一半；保长以下统统靠不住！”

我们坚持在内线积极活动，真象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搅得敌人五脏六腑如绞如割，因而到一九四三年春天，敌人再次发起了军事“清乡”。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出动时经常穿便衣，化装成我们的游击队员，打听我们的消息。有时整队伪军下来，夜间在农村里住宿，生活上完全模仿我们的一套，想来迷惑群众，追寻我们的踪迹。不过敌人再怎样伪装得好，也骗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有时伪军便衣队和我们住到一个宅子里，他们住前面，我们住后面，他们都没法知道我们。这是因为群众和我们一条心。

这次反“清乡”，我们曾袭击了新场。它是浦东中心区里一个较大的据点。西头驻了一队日本鬼子，东头驻了伪军刘铁成一个中队。街上钉了木栅门，警戒严密，不易接近。我们还是采用老办法，通过一个保长，和伪军的事务长拉上关系，又搞来了敌人的口令。夜里，我们混进了木栅门，揪倒了哨兵，一直冲进伪军的营房，把睡梦中的一百多伪军全部缴了械，只有少数在楼上赌钱的伪军，从屋顶上爬出去逃跑了。驻在西头的日本鬼子，相隔不过几百米，也不敢出来增援。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袭击这样大的据点的是一支二三十人的小游击队。

之后，我们又采取避实击虚、里应外合的战术，袭击了钱家桥鬼子据点，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把敌人刚发下来的九六式轻机枪也缴来了。又在庙经港打了一次伏击，打翻了敌人的脚划船，除日本小队长赤口逃跑而外，该小队全部被消灭。这一连串的胜利，逼着敌人又把三灶、梁

店、青村港、钱家桥、坦直桥等等中等据点也撤了。吓得刘铁成部下的几个中队长急忙派人来联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积极地开展了对伪军的策反工作,利用泰日桥敌伪军内部矛盾,促使一个伪军中队长打死八名鬼子,率领一个中队伪军反正。这一行动,引起伪军内部极度的动摇。日本鬼子对刘铁成部队也不信任了,慌忙把它全部撤出浦东。

青纱帐又起来了。鬼子“清乡”一年,毫无收获,劲头也就不大了。同时,敌人也不可能把它的主力部队长期地陷在一个地区里。隔不多久,就有部分鬼子兵调出去了。后来,“清乡区”四周的篱笆墙也给老百姓扒得七零八落的。敌人再一次的所谓“高度清乡”,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反“清乡”胜利一周年,我们在海边邬家店开了庆祝大会,当地群众和外来参加开会的人可真不少,连过去找不上的那些统战关系,也都自动找上门来。我们的队伍,也不再是十二个人的短枪队,而是一支拥有三挺机枪,好几百人的长枪队了。

痛歼保田大队

朱 传 保

一九四二年中秋节前，我新四军一师三旅第七团，回到了苏中四分区二窰附近。部队刚刚打了胜仗，准备把祝捷和过节合起来庆祝一番。各连排练节目，教新歌，杀猪，买月饼，搞得热热闹闹。谁想，中秋节一早刚起来，情况传来：日寇保田中佐亲率五十二大队（保田大队）一部和一帮“黑老鸦”（伪军），昨夜占了白龙庙，现在正直奔北新桥。

接着旅首长来了指示：保田要钻我们的空子，他认为我们刚攻下石港、灵甸港、宋季港，兵疲马乏，又是中秋节，想搞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呢？也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他个意外的打击。

“打好仗过中秋节”的口号，立刻在部队中响起。我们研究保田的行动之后，决定派四连先出击，把保田引到二窰附近来，组织部队歼灭它。

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呢？派出四连之后，我们几个同志围着地图，边琢磨，边等消息。保田会不会跟四连来呢？开头，我们估计会来。因为自入夏以后，他连吃了几次败仗，特别是在斜桥、三阳镇被吃掉一个小队以后，他十分气恼，曾多次放风，要找我们决战。今天我们主动给他打招呼，自然会咬住不放。可是，一想到保田这个老滑头，又觉得不是好骗的。这家伙，是日寇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南浦少将手下的一个打手，我们跟他交手近三年了，几次想吃掉他，都落了空。

“对付保田，必须有几个方案。”彭德清政委说，“他象个玻璃球，滑得没角没棱，只有一个套子，是套不住的。”说完这话，以商讨的目光望着严团长。

严团长曾经跟贺龙同志当过警卫员，贺总的指挥艺术，给了他很大影响，下达决心快，处理情况果断。他打仗有个习惯，下决心时爱卷袖子。我们和他一块作战，只要看他卷袖子，就猜他准是胸有成竹了。现在四连出击情况还不明，还没到卷袖子的时候。他听了彭政委的分析，深思了片刻，同意地点点头说：“对，对付保田这个老滑头，一个套子是不行的。这样吧，来了就打，跑了就撵，一定要争取在运动中打垮他。”

彭政委又说：“有一条，我们决不跟着它打转转。”

严团长立刻同意地说：“对，不能眼它转。”

我们团的几个同志刚走出村，迎面跑来一匹快马。走近一看，是二营的小通信员，他跳下马，喘吁吁地说：“报告团长、政委，营长说保田大队没上北新桥，钻到哪里去啦，暂时不明，四连正跟踪去找！”

听到这消息，我们三个人目光一交流，几乎是同声地说：“怎么，保田没上北新桥？”

严团长告诉二营通信员说：“要四连停止追，派出少数人继续侦察。”

“是！”通信员飞马而去。

侦察兵、通信员不停地一个接一个报告：保田大队在二窰以南出现。

突然，又一个侦察员报告：“保田大队占领了余西！”

这句话，象锤子似的重重地敲在我们心上。余西，它是二窰偏南一点的村子，距离我们旅指挥部驻地刘家园很近。敌人莫不是要搞我们的首脑机关？这一情况，引起了我们的严重注意。不能继续按兵不动了，要向余西方向调动部队，要保卫指挥机关。严团长两眼盯着地图，另一只手开始卷袖子了。

恰在这紧要的关头，旅首长又来了指示：保田在虚弄刀枪，不要为他迷惑，要稳住。

首长的指示，象猛然捅破一层纱罩，坚定了我们按兵不动的决心。然而，我们几个人心里并不平静，反复看着地图，研究着从今早开始保田这个鬼东西走的“之”字路，考虑着不同的对策。

随着一声“报告”，跑进个侦察员：“敌人又从余西向西开了！”院着眼巴巴地望着我们，那神情象是说：“首长，快下决心吧，要不来不及啦！”彭政委眼睛一亮，说：“完全证明，保田搞的是调虎离山计，它继续向西，很可能是想调动我们，离开二窰，然后突然掉回头来再进攻二窰。”

严团长说：“这个鬼东西，就是给我们‘刷坛子’！”

根据敌人这一系列的变化，我们断定，它要回过头来，必定要取道夏家渡。于是，我们相应地作了计划，加强夏家渡方向的兵力。严团长把刚才跑来的侦察员叫过来，嘱咐说：“快去，到南边，告诉二营营长，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侦察员一听叫他上南，简直不信自己的耳朵了，走上一步问道：“团长，叫我上哪？”

“南边，二营”，团长看他不动，补了一句：“快跑步！”

侦察员应了声“是”，飞似的出了指挥所。这时，我们才想到没吃早饭，便叫警卫员快搞点吃的，吃饱好打仗。

警卫员送上饭，我们刚咽下几口，南面二营方向传来了激烈枪声。果然不错，保田大队转到夏家渡方向来了。在战场上，指挥员最大的愉快，是敌人按着我们设想的走。枪响了，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几个人分头跑出了指挥所。